

к с і

十九世紀中國的獨特文化存在

——郭實腊的小說創作与評論

宋莉華*

<目 次>

- 一. 序 言
- 二. 對中國白話小說的評論与倡導
- 三. 小說創作与小說文体的泛化
- 四. 文化層面的解讀

一. 序 言

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為宣揚教義或改變中國人的觀念，嘗試用中文撰寫小說或將《聖經》改編成通俗小說，以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郭實腊（Karl Gützlaff, 1803-1851）無疑是其中最為高產和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這位充滿傳奇色彩、在傳教士中倍受爭議的人物，出生于普魯士，1827年受荷蘭教會資助來到中國，初抵巴達維亞，1828年到達新加坡、暹羅，1829年又來到新加坡和馬六甲，轉而效力于倫敦教會，靠他的第一任妻子——一位他在馬六甲結識并成婚的英國傳教士為生，偶爾也從教會團體獲得資助。1830年到達暹羅，1831年旅居曼谷。郭實腊酷愛旅行，1831年至1833年間，在外國傳教士尚未獲准前往中國自由傳教的情況下，他作為翻譯和外科医生先后三次搭乘

*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E研究院副教授。

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勳爵号(the Lord Amherst)、鴉片商人查頓(William Jardine)的風精号(Sylph)到中國沿海旅行。1835年他開始接受英國政府的系列任命，1843年以后接替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担任香港總督的中文秘書直至去世。

這些經歷使郭實腊的身份變得相當複雜，既是布道者、小說作者、天才的語言學家、學者，又是冒險的旅行家、長期生活在中國的歐洲人、貿易公司的雇員、英國政府的官員。他的小說正是其多重身份共同作用下的產物。据1867年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歸入郭實腊名下的中文著作有六十一種之多，其中大約四分之一為小說。然而這些作品之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絕不僅僅因為其數量上的優勢，也并非出于欣賞其高超的小說藝術，而是由于這些小說本身已構成了十九世紀中國一種極為獨特的文化存在。其中所呈現出的文化形態格外複雜，它們顯然已不應當僅僅被視作純文學文本，對其進行文化層面的解讀顯得更為意義重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討論和分析中不得不對其作品采用概括和摘要的方法。

二、對中國白話小說的評論與倡導

郭實腊在中文小說方面的創作實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非凡的語言天賦。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很早就意識到小說的重要性，並在閱讀中國傳統小說的過程中，自覺地加以模仿，創作中文小說。

關於郭實腊具體何時開始閱讀中國小說，我們不得而知，可能早在1828年他初到暹羅時即已開始。早在1833年，在郭實腊對中國沿海進行第三次旅行途中，普陀山的僧人們贈給他一本《香山寶卷》。該書被他看成一本“佛教小

說”，郭實腊評論它用“通俗易懂的甚至是一種淺顯的風格”[1]寫成，並將之視作為了宣傳宗教而運用小說文體的范例。1835年，他在《中國叢報》上發表文章，將自己與精通儒家典籍的“漢學家們”截然分開，強調小說的重要性和對讀者的吸引力：“中國的宅第中擁有整個的圖書館，而人們除了小說對其他書籍不屑一顧。”

從1838年9月開始，郭實腊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紹並評論中國小說，其中主要是歷史演義，也包括部分世情小說和文言小說。首先是被他譽為“中國巔峰之作之一”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他對該書的語言和敘事能力大加贊賞：“作者越接近巨大的災難，語言就越有力，就越使人悲愴。無人不在閱讀時對其中的事件留下持久的印象，這些事件會飛快地在他眼前掠過，使他為大結局——建立統一的君主國而興奮”，“但是不管作者如何描述當地的景色，或者拋開戰鬥場景而去向讀者介紹國君的宮殿和顧問班子，生動活潑顯然是該書最大的優勢。我們越是與他一同進入細節之處，越能發現其語言的精美”，“這部作品可以視為歷史著作的風格典范，但絕不能被當作任何著作的模式。它對人性的高度刻畫很難在其它地方見到，它是對身處那個時代的人的激情、惡行的記錄。相同的語匯常常一次又一次出現，而這部書以語言精練而不是豐富著稱。句子都很簡潔，沒有一處忽略語言的和諧悅耳，然而作者更為關注的是表達獨創性的思想，而不是流利婉轉的詞藻，這使他獨樹一幟。”

郭實腊對《南宋志傳》顯然也十分激賞：

我們發現此書的題目有誤，因為書中的內容并非象目標榜的那樣是寫南宋的歷史。然而，它是我們所讀過的最為生動有趣的中國圖書之一。其風格不僅簡單易曉，而且展現出高度秩序的美，可以視為佳作的典范。我們感到綜觀全書，沒有一點晦澀之處。書中沒有絲毫的偽裝、虛飾，既不顯示才學也不引經據典。作者的描述極為生動，就象他看到了發生的事情，並一路跟隨英雄們的冒險歷程。他引領着你，通過某一個人物的活動展示他的個性，由你自己判斷他們的價值。你決不會由於長篇大論或者次要人物的介紹而迷失歷史線索。作者的宏旨在於表現宋朝是如何實現統一集權的，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完成了這一任務。該書很適合初學者，最好的漢學家也可以從中學到流暢地進行寫作的秘訣，使用雅馴的表達方式而不是賣弄學問。

1838年出版的他的《開放的中國》第十二章也專門有一節介紹中國的小說¹，所關注的仍然是歷史小說。 Cornhill1838,pp467-468郭實腊提到《三國志演義》、《五虎平南后傳》、《群英杰》、《東周列國志》、《萃忠傳》五部小說在當時非常流行，几乎人手一冊，并說明這只占總數的一小部分：“歷朝歷代都有類似性質的作品。每一位偉人都有人為之立傳，每一次天災人禍都有演繹它的講史小說。盡管其中不乏无聊之作，但也有許多風格各异的佳作，這些作品是每一个希冀寫出一部中國歷史杰作的外國人必讀的。”這種關注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創作實踐中，在歷史演義的影響下，郭實腊創作了諸多歷史題材的小說，如描述英國歷史的小說《大英國統志》（1834），描述世界歷史的小說《古今萬國綱鑒》（1838）將歷史與小說雜糅。描述《聖經》歷史故事的小說《聖書注疏》（1839）則根據中國歷史年表謹慎地確定事件發生的時間，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歷史意識。《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中《東西史記和合》、《拿破侖翁》、《馬理王后略說》等也都有歷史演義的痕迹。此外，郭實腊在《中國叢報》上還分別介紹、評論了《神仙通鑒》、《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智囊補》、《聊齋志異》、《紅樓夢》等²。

郭實腊的評論觸及語言運用、人物塑造、情節設置、場景描寫等，但他最為關注的是語言。中國小說之所以受到他的推崇，根本原因在于它們用淺顯曉暢的白話寫成，通俗生動，引人入勝。因此郭實腊主張學習白話小說“平易，通俗并且輕鬆愉快的風格。這樣給讀者提供指導的時候，他們才可能樂于去讀。”這其實是十九世紀許多新教傳教士的共識。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在《中國文學筆記》序言中提到，早在1822年教會就出版了由法國傳教士帶回并進行翻譯的中國小說。³ 他本人則在該書中開列了137種當時書坊暢銷的中國白話小說書目，以艷情小說、世情小說和話本小說為主。另外他所著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也很留意介紹傳教士所著的中文小說。英國

1)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65, Cornhill1838,pp467-468.

2) 見Chinese Repository, 《神仙通鑒》見7-10 (1839)；《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見9-2 (1840)；《智囊補》見10-10 (1841)；《聊齋志異》見11-4 (1842)；《紅樓夢》見11-5 (1842), pp266-274

3)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by Alexander Wylie, Agen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China. Shanghai 1867p i ,pX ii X iii

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同樣很早就對中國小說發生了興趣。1842年中期, 他形成出版附有翻譯和注釋的四書五經 (它們也被称作“中國的摩西五書”) 的偉大构想, 但由于過於晦澀難懂, “因此, 作為初步嘗試, 我把《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交到了他 (指理雅各的學生何進善) 手中, 并發現隨着翻譯的深入, 這項工作也逐步激起我們的興趣。一有空閑, 我就盡力修訂譯文, 既借此提高自己的中文, 也希望改進它以便被公衆接受并有益處。”這篇小說的譯序及譯本1843年在倫敦出版。同時, 理雅各把他所掌握的有關中國傳統小說的技巧運用于描寫兩個聖經人物的傳記中, 他用小說体撰寫了六回的《約瑟紀略》(序言標注1852年) 与四回的《亞伯拉罕紀略》(序言標注1857年)。除日期外, 兩部作品的中文序言相同, 都提到: “此紀雖似小說之体, 實非小說之流。”說明是以小說体書寫《聖經》內容以使其引人入胜。二書都謹慎地使用了中國編年, 把約瑟定于商代, 亞伯拉罕定于夏朝。并在回末使用章回小說的套語作結, 如“欲知約瑟何在, 請听下回分解。”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曾將《列國志》的全部譯成英文, 將前兩章修改后發表于1880年1月的《新英格蘭人》雜誌上⁴。在1877年上海召開的傳教士大會上開展了關於“世俗文學”的討論, 美國傳教士丁韋良 (W.A.P. Martin, 1827-1916) 提到需要小說, 但不要走得太遠。他本人則有閱讀小說《鏡花緣》的經歷⁵。1882年圣教書社的印度代表墨獨克 (John Murdoch) 應邀來華考察。他的報告中有一部分題為“通俗文學”, 其中提到了讀者“對休閒讀物的渴求”并建議傳教士們盡量創作小說以滿足這種需求⁶。

事實上, 嘗試運用通俗生動的白話小說宣揚教義以獲得更好的傳教效果, 已經成為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的共識及其獨創的傳教方式。從1819年第一部新教

4) 參見《衛三畏平及書信》, [美] 衛斐列著, 顧鈞、江莉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頁142。

5) 參見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227-235; 《花甲乙記》, [美] 丁韋良著, 沈弘等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頁8。

6) 事實上, 天主教傳教士在十八世紀已經開創了寫中文小說的先河, 但數量有限, 且未公開出版。關於新教傳教士小說發展史及代表作, 參見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限于論題和篇幅, 本文不再贅述。楊格非之后, 傳教士的文學活動雖仍在繼續, 但很難見到原創小說了。

傳教士小說米恰 (William Milne, 1785-1822) 的《張遠兩友相論》到1882年楊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的《引家當道》，短短數十年間，傳教士們對於小說創作可謂樂此不疲。⁴其中尤以郭實腊創作的小說數量最為驚人。

三、小說創作与小說文体的泛化

有關新教傳教士創作白話小說，儘管之前已經有米恰、馬禮遜等人的成功嘗試，然而在對白話小說的套路与技巧的運用上，郭實腊无疑走得更快、更遠。

基于對中國小說的興趣和對小說傳播效果的深信不疑，郭實腊很快就掌握了章回小說的套路，在行文中嫻熟地使用諸如“且說”、“却說”、“話說”、“不在話下”這一類說書人的套語，添加回目、篇尾詩等，以迎合中國讀者的審美趣味与閱讀習慣。基于同樣的目的，他的《贖罪之道傳》(1834)、《圣書注疏》(1839)等書都按照中國歷史編年敘述《聖經》故事，如“当夏帝局年間，上帝諸族類中，擇一人家，感其心，正其意，設之為救世者之宗祖也，名曰亞伯拉罕”云云。

在情節設置上，郭實腊注意在行文中穿插着跌宕起伏的故事。從敘事文學的角度看，郭實腊确实比他的傳教士前輩技高一籌。他的《贖罪之道傳》、《常活之道傳》(1834)、《誨謨訓道》(1838)等作品都具有較强的故事性。如《贖罪之道傳》講述了“明朝年間有一科甲翰林姓林名德表字道顯，厦門人氏”，“其為人最重義，官又高，家又富，才學政望，与尊貴极相契厚，每每于公事之暇，不是他尋友，就是友訪他。”這位林翰林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既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正面典型，又是貫穿全書的線索人物，由他逐一牽出了吳御史、李老叟、李老叟的學生蘇連幸、半夜到蘇連幸府上借宿的陳兩、林德昭等才學之士，這些篤信基督教的儒士間相互討論教義构成了小說文本的主体。同

時，由于小人作梗或執迷不悟出現了一系列波瀾。第七回叙蘇連幸的朋友楊太常為人驕傲貪忌、終日趨迎權貴，听不進蘇連幸与林翰林的勸告，縱情酒肉聲色，最終酒醉不治身亡（第七回）。又有周行浪等人將牧師謝德列及教徒告到黃知縣，請其查辦邪教。結果謝牧師以教義和自身的气度征服了黃知縣，但他仍不安心，招謝先生解耶穌之道，最終心悅誠服（第十一、十二回）。之后有進士吳利得內多貪忌，外好濫交，對基督教教義不以為然，与林翰林展開唇槍舌劍的討論，多次出言不遜。數次交鋒后又惧又悚，開始篤信基督，并与朋友討論耶穌之教（第十四—十七回）。全書以林翰林与朋友李御史討論并總結贖罪之道作結（第十八回）。在另一部小說《常活之道傳》中，主人公李瑞的經歷也十分曲折，通過他艱難的轉變深入刻畫了這一人物的心路歷程。由上述可知，郭實腊的小說無論在人物還是情節上都更追求多樣性与複雜性，因而其文學成就超越了其他傳教士作者，而這也正是中國傳統小說的一个特点。聯系到他對中國小說的閱讀与重視，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是受到了中國小說影響的結果。

情節，削弱了其叙事性，因而內容顯得極為駁雜，模糊了小說的文体特征。如《大英國統志》中甚至連篇累牘地開列英國對外貿易的清單，介紹其殖民地，使小說特性大打折扣。《是非略論》簡直就是一篇陳述中國應加入互惠貿易關係的長篇咨文。書叙广州人陳擇善，自幼即成孤儿，后設法去倫敦，在那里開了店，生意興隆。二十五年后他回到家鄉，与一个姓李的仇視外國人并充滿偏見的朋友展開了一連串辯論。作者宣称外國人，特別是英國人，既不是“紅毛番鬼”也不是“夷人”，而是代表着一种先進的文化。根据文化或軍事實力，英國不應被作為進貢國來對待，外商及其家眷則應受到禮遇。該書最后一章談到了英國的基督教，教育、語言与寫作、自由交往与自願結婚的婚姻習俗，并且強調了英國婦女的地位。

由于白話小說為一般讀者所喜聞樂見，具有較好的傳播效果，同時其淺顯的語言對身為異國人又急于播揚西方文化、解釋教義的郭實腊也更易于把握，因此小說筆法被他广泛應用于各類寫作，甚至達到了過于隨意与寬泛的程度。其

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是爲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技藝、科學與準則。它將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蠻夷’”。“較妙的方法”之一便是用小說的筆法，論、史、新聞、雜文等各類文体中都可以見到白話小說的印記。試看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刊的“叙話”，不僅有篇首詩，其聲口、其套路也純爲小說的，：

詩曰：從來人世美前程，不是尋常旦夕成。翻徹千端方是衰，醜梅面備如爲羹。

話說漢人姓王名發法，與英吉利人姓陳名萬交接。王進房子，偶然看《東西洋考》書在桌。陳道：“相公高識于書理，有不佳處，不妨指示。”王道：“晚生豈敢。此書清新俊逸，無以加矣，更有何說！”英吉利人吃一驚，說道：“好話甚，請貴相公直示其委曲。蓋加過免錯是著者所甚愿，特意成全其篇，致各人獲益。”王忙打一恭，答道：“小弟原安承教，隨分付將查之。與相公知其錯。”陳喜顏道：“著作的不飾人耳目，不讀氣折大巫，既是如此未免漸穢于珠玉之前。但仰貴國之士商，照顧賞拔群英，不恐誤大事，只竭力盡心明示，各樣文藝可讀之無厭焉。萬望相公等，素性愛才，留心訪究，件件事情，睹其長短。”王道：“先生一電鑒自知，何必更考？”陳道：“因爲漢人纂此書，唐人必考之，彼此免得有差，是著者之情愿。”

又知道光癸巳年六月刊“新聞”在報道“土耳其國事”、“荷蘭國事”之前，先象說書人一般來一段引子：

在广州府有兩個朋友，一個姓王，一個姓陳，兩人皆好學，盡理行義，因極相契好，每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尋我就我訪你。且陳相公與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規矩。因往來慣了，情義浹洽，全無一點客套，雖人笑他，却殊覺笑差了，不打緊。忽一日，來見王相公說道：“小弟今日偶然聽聞外國的人，纂輯《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莫勝快樂。”王道：“晚生大可取，總有妙才，轉環之智。若喪心喪德，使詭設詐，此不可交。”陳道：“然也。那書的著文者，特意推德行廣知識，不亦說乎？”二人就拿一篇《東西洋考》之讀。

最后又有一段，上承引子結束全文：

且說陳相公讀了。王道：“甚望其著文者，詳明委曲。后月推广每月之新聞則中意。”陳答：“這也小事，只情愿讀者都加意閱之。”王犹沉吟不動身，一点時就道：“年兄之言最是。小弟不疑省之士与商等，明曉其文之大用，莫不必照顧。”講完兩友拜別而去。

整个結構犹如一話本小說，前有人話，正話即新聞內容，后有結尾。這種報道新聞的方式在其它刊物中也是絕无僅有的。這種做法對小說文体本身發展的利弊姑且不論，但《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在當時确乎受到歡迎，1834年，若干刊物還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

綜上所述，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郭實腊的中文小說都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体现出中西方不同文化、語言表達方式、寫作手法的碰撞与交織，耐人尋味，給讀者以獨特的審美體驗⁷。

四、文化層面的解讀

十九世紀東西方關係得到了广泛而急切的關注，東西方之間的距离在整个十九世紀一直處于不斷縮小的過程中，東西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則不斷發生碰撞与融合。郭實腊的小說就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一方面，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章回小說的套路与技巧寫作小說或小說式的文章，用儒家學說附會基督教教義，体现了基督教与中國文化融合的本土化的努力。他的作品中對儒家學說与中國古訓的引用非常引人注目，郭實腊熱衷于在文中連篇累牘地引用儒家經典，与基督教的觀點進行互証。如《誨謨訓道》第一回寫基督徒陳委化用《論語》“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勸諭貪財而吝嗇的商人勤跨：

他[指陳委]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犹奔敝蹶矣。若留心于富貴，如春夢浮

⁷ 參見《東西洋考母月統計傳》“導演”，頁二五。

云。況生不携一縷，死不能帶半縷，就有嶽財也，化陣清風而去矣。”耶穌曰：“謹慎勿貪財，蓋本業盛余者，非真生命也。遂以比喻言。”

他甚至從儒家典籍摘章引句刻于封面的醒目位置，以期獲得文人讀者的認同。如道光丙申年鐫本《贖罪之道傳》題“朱子謂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引文多出自四書五經，以《書經》、《論語》、《孟子》最多。目的性很强，即尋找基督教與儒家之間的聯系，附儒合儒，至少使二者相互接近的思想觀點與經驗可以并存。但是，其對儒家經典的闡釋大多只能說是西方式的解釋，服從傳教利益的解釋，是對本義未能完全參透或有意稍加歪曲的解釋⁸。另一方面，郭實腊又對佛教和道教表現出強烈的排斥與攻擊。與儒家學說相比，佛教和道教具有宗教突出的神聖性與排它性，與基督教存在更為明顯的沖突。因此，郭實腊在主張基督教的理性一神論方面態度十分堅決，對佛教與道教消極的而又廣泛流傳的多神論、偶像崇拜等傳統不斷提出挑戰，同時觸及了深入人心的佛教輪回轉世的觀念、道教所追求的長生不死與基督教的復活思想之間的比較，民間流行的道教偶像崇拜則被他視作低劣的迷信行為受到批駁。如《贖罪之道傳》中，他將儒、釋、道的人生態度與基督徒相比較：

吳公道：“老先生說來最有理，進教解悶舒懷。但愚見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孟崇現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莫若今日飲酒食肉，明日諸事罷了。”且說林公听此言，甚怒道：“吉凶禍福由于天，非人所能主也。但放肆淫邪，招皇上帝之怒。輕聖教，縱邪欲，莫不惹萬禍。上帝鑒萬人，連心之私思可知也。相公若弃其實且隨影，一定遭難無盡矣。”

“文化對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証實的東西是寬容的；而對它所排斥和貶低的就不那麼仁慈了。”由于作者自身所植根的歐洲宗教、文化、歷史背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貫穿了郭實腊創作的始末。

較之于其他傳教士，郭實腊的小說對中國的社會現實有更多的反映，但大多為負面報道。針對無知民衆沉迷鴉片、難于自拔的時弊，他一再痛陳鴉片的危

⁸ 參見拙文《十九世紀傳教士小說的文化解讀》，《文學評論》2005第1期。

害（儘管基督教新教的大規模傳播與鴉片和艦船的侵入難逃干系，郭實腊本人也有搭乘鴉片商船到中國旅行的經歷），意圖通過描寫吸鴉片者的悲慘下場警醒世人。小說《誨謨訓道》（1838）通過主人公万行因吸食鴉片、尋花問柳最終慘死野外，門咨因吸鴉片、賭博家破人亡，后改邪歸正，篤信基督的經歷，直接、形象地揭示了鴉片的危害。而最早提到鴉片之害的中國小說《風月夢》要遲至十年后才問世⁹，并且其中雖描寫了鴉片烟鬼鳳林與賈銘，但并不出于警世的動機，吸鴉片并未給鳳林的生活帶來任何厄運，而賈銘雖獲牢獄之災，也不是因為吸鴉片本身，而是遭了小人暗算。中國儒林的種種丑態同樣沒有逃過郭實腊的眼睛。如《贖罪之道傳》寫到有些考生倚仗家財尋找槍手：

且說林翰林為人，見識學問兼全。适才有人文字雖不甚通，家道却十分富厚，不肯讀書，獨在酒色上用心。忽試期在邇，只好掩人之耳目。因林翰林官高才大，聲名昭人耳目，每日求拜門下者不少也，只不肯代為捉刀，替他們夤緣。人有庸才，多借林公之辭自飾。暗想道：“黃白之物，何人不動心？”但只林翰林敬畏上帝，視偏党如重罪也，却結怨誠恐惹禍出來。

但作品在細節的表現與生動性上顯得極為不足，這類事件僅僅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獲得浮光掠影的描寫。因此，盡管郭實腊的小說中一再寫到儒士及科舉考試，但讀者從中不可能獲得與閱讀《儒林外史》相同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作為傳教士，他非常關注中國的傳教環境，多次寫到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教徒的處境十分艱難，內容觸及禁教、教徒與住民關係、儒林對基督教的態度等。如《正邪比較》（1838）敘述了三位朋友陳成大、吳瞻能、馬福領嘗試理解基督教的故事。該書第二回“論伸說端曲”寫馬福領、陳成大對基督教心存顧慮，一面差人探聽耶穌聖公會的情況，一面查勘官府戒令邪教的禁例。二人終於怕受拖累而找了一個僻靜地方隱居起來。結果身為基督徒的吳瞻能設法打聽到二人住所，一番講道之后，邀請二人到教堂參觀教徒集會以打消其顧慮。這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形。許多儒生因為信教而受到非議，如《贖罪之道傳》

⁹ 在《風月夢》序中作者所注目的時間為1848年。

第十一回寫：“且說蘇連幸得一个案首，又添了許多聲名。人家見他年小才高，又人物俊秀，却又怪与天道之徒交接。”而牧師謝德列及教民則被視為邪教徒被告到知縣處。

上述描寫表明，郭實腊對在場的、顯在的中國的描述与早期耶穌會士筆下燦爛文明的古國之間形成了巨大落差。他通過個人的視角与經歷對中國進行了重构，勾勒出這個老大帝國的另一種形象：專制主義、封閉自大以及弥漫于其間的吸鴉片、賭博、嫖妓的社會風氣。不可否認，這些負面描寫中融入了作者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懷，表達了他對社會領域以及如何呈現社會領域的思考，希望提高民衆素質、扭轉社會風氣。然而，這裡却刻意回避了一個事實，即鴉片在中國的蔓延正是由于帝國主義的擴張，是列強用堅船利炮帶進來的，而賭博、嫖妓的社會惡習也并非中國所獨有，在歐洲同樣普遍存在。作者帶着先驗的文化取向，把歐洲特別是英國作為參照系，中國被排斥在歐洲科學、藝術和商業發展的主流之外，成為需要歐洲關注、重构甚至拯救的對象。

因此，郭實腊借用中國傳統小說的外殼注入大量西方的宗教、政治、文化內容，使之成為展示西方文明的百科全書，向中國人進行傳播、灌輸。与同時代的新教傳教士相比，他的小說在內容上已遠遠超越了宗教範疇；与晚明以來耶穌會士的著作相比，他對西方的介紹，則重點從科學技術与物質文明轉移到了貿易、外交、政治体制、文化、教育及社會習俗方面，而中國維新黨人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向往与效仿的實踐，大約過了六十年才開始。英國作為郭實腊心目中的理想國度与文明的象征，一再被詳盡介紹。最為常見的方式是，中國人到西方旅行或進行貿易，通過書信、歸國与親友聚談向國人介紹那里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大英國統志》、《誠崇拜類函》都屬於此類。《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中這類書信也比比皆是，通過海外華人的鴻雁傳書來簡單介紹、評價西方世界，如“子外寄父”（甲午年四月）、“姪外奉姑書”（丁酉年二月）、“姪外奉叔書”（丁酉年六月）、“叔家答姪”和“姪覆叔書”（丁酉年七月）等。

中國自康熙末年禁教以來，基本奉行閉關鎖國政策。十七、十八世紀，雖然曾有少數人出洋，但由于他們文化水平較低，几乎无人寫過有關西方的書籍和

游記。直到十九世紀初，清廷對世界形勢的認識還几乎一无所知，對歐洲各國的地理、相互關係認識一片混亂¹⁰。從這個角度看，郭實腊的小說似乎彌補了這一不足，可以极大地開闊中國人的眼界。然而，他却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以歐洲文化優越論取代了中國的盲目自大，他的身份決定了他在書中將成為大英帝國的代言人。帝國主義是一種制度，當這種統治被當作傳播文明的使命時，統治者的社會經驗必然無可選擇地依賴於殖民地和當地人，但傳教者的目的却是要教育當地人接受“我們的”文明。正如郭實腊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創刊緣起中所說：

當文明几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并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獨中國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仍自稱為天下諸民族之首尊，并視所有其他民族為“蠻夷”。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可有較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蠻夷”；編者偏向於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

郭實腊的小說融中西方宗教、政治、文化、社會現實於一體，試圖構築一個中間地帶，使文學與政治和宗教、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傳教士與中國的民眾及官府，彼此溝通，以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與開放。但作為一個身處十九世紀的歐洲人、服務於英國政府的官員，郭實腊很難擺脫帝國主義與歐洲優越論的論調。而且英國作為一種帝國主義類型，比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更加自命不凡和咄咄逼人。這些特征在身為英國政府代言人的郭實腊身上及其小說中表露無遺。

事實上，郭實腊并非特例，他是當時傳教士群體中的一員。其中的許多人在神職人員之外都兼任過其他角色，同樣有過辦報、寫作與出版小說以及為西方駐華官方機構服務的經歷，郭實腊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個。由於他的小說所包含的社會現實與文化內涵，本文認為它們不僅僅屬於中國近代小說範疇，而是構成了十九世紀中國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

¹⁰ 參見張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頁 87。

《참고문헌》

Remarks on Buddhism together with brief notices of the island of Poo-to, and of the numerous priests who inhabit it, Chinese Repository 2·5 (1833), p223. 郭實腊于是年二月, 在他第三次旅行的返程途中訪問該島。文中的priest實指当地佛教僧侶, 并非牧師, 不知郭實腊此處為何未使用Buddhist或monk。

Chinese Repository 10·10 (1841), p554.

Chinese Repository 7·5 (1838), p233.

Chinese Repository 7·5 (1838), p249

Chinese Repository 11·10 (1842), p540.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65, Cornhill1838,p468.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3·12 (1835), p566.

參見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Patrick Han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0·2, pp433-434.

愛漢者纂《贖罪之道傳》卷一第五回“論善人之死”, 道光丙申年(1836)鐫, 頁一四。

《贖罪之道傳》卷一第一回“論賢士教人逾万物之主宰”, 頁一。

1833年6月郭實腊創刊緣起, 原載Chinese Repository (1833), 譯文轉引自《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導言”, 愛漢者等編, 黃時鑑整理, 北京: 中華書局1997, 頁一二。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癸巳年十二月, 頁六三。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癸巳年六月, 頁八。

《誨謏訓道》, 道光十八年(1838)鐫, 新嘉坡堅夏書院藏板, 頁三。

《贖罪之道傳》第十四回“論真道自证”, 頁一九。

《薩義德《文化与帝國主義》, 李琨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頁17。

《贖罪之道傳》卷一第三回“論人之善与人之惡明白”, 頁七。

《贖罪之道傳》卷二第十一回“論約翰鐸德”, 頁六。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導言”, 頁一二。

《中文摘要》

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郭實腊用中文寫作了大量白話小說, 它們在形式與內容上都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給人以獨特的審美體驗。然而, 由于作者所植根的西方歷史文化背景和他所處的中國近代特定的歷史環境, 小說中所包含的文化形態與傾向極為複雜, 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种獨特的文化存在。

關鍵詞: 郭實腊 小說 文化